前　言

英、法、德、俄、日、美等西方大国是20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几个主要角色，它们策动的大规模战争最多，制定和实施的战争计划最多。从我国战略研究的需要出发研究这些战争计划，对于充分地了解现代战争计划的实践经验和发展规律，特别是从借鉴和对策的角度有针对性地剖析西方大国战略，是很有必要的。本文试做初步的探讨。

（一）

战争计划即进行战争的全盘方案，是战争指导的基本方法和主要形式，国家战争政策与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战争计划规定进行战争的目的、手段和方法，通常包括战争形势判断、战争意图、战争指导方针、战前准备、战争实施、战时保障以及战后安排等内容。战争计划总括为达成战争目的而采取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宣传等各个方面的决策和措施，其核心部分是武装力量准备与实施战争的战略计划。

战争计划的内容和形式取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根据战争计划的性质和特点，可以区分出若干一般计划类型，主要是：

——按战争的政治性质分：侵略战争计划与反侵略战争计划；

——按战争的军事性质分：进攻性战争计划与防御性战争计划；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按战争规模分：全面战争计划与局部（有限）战争计划；
——按战争类型分：核战争计划与常规战争计划；
——按地缘范围分：国家战争计划与联盟战争计划；
——按作战形态分：正规战计划、游击战计划与特种战计划；
——按战略阶段分：平时计划、战前计划与战时计划；
——按计划形式分：概略性计划与周密性计划。

（二）

在西方军事理论中，战争计划这个术语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的战争计划覆盖战争指导的各个方面，泛指战争决策的计划性内容，如战争的目标、方针、方案、措施、部署等。狭义的战争计划即军事计划的总称，包括作战计划（战略计划、战役计划和战斗计划）以及武装力量和国民经济的平时准备、战前动员与战时保障计划，或者专指在战争或战争某个阶段中使用武装力量的战略计划。

从实践情况看，20 世纪西方大国战争计划并不限于军事计划范畴，而是由多层次、多领域的各类战争指导计划组成的复合计划体系，最高层次是国家战略计划或大战略计划，其下是战争指导的内政计划、军事计划、外交计划、经济计划、宣传计划等，每个方面的计划还要展开为具体的实施方案。由战争指导的中心问题即如何准备和实施武装斗争所决定，使用武装力量的战略计划在西方大国战争计划体系中总是居于核心地位。

本文主要研究西方大国战争计划的军事战略内容，重点是各国制定与实施战争计划的战略思想，对战争计划的体制和方法问题也有所论及。

（三）

就近几十年的情况看，系统地研究战争计划问题的著作在国内外尚很少见。在西方国家的战史论著中，对战争计划问题常有评介，但往往有局限性，或局限于西方的政治立场、历史观和战争观，或局限于作者所属国家的政策与战略观点，或局限于个别战争、个别战例。由于存在这些局限性，不少西方研究著作在选材和论点上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对于一些战争计划反映得不全面、分析得不深刻，甚至在一些实质性问题上有意遮掩、回避。

本文着重于对 20 世纪西方大国战争计划进行整体性研究。从 19 世纪末开始，随着由来已久的西方大国殖民扩张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争夺世界霸权成为西方列强对外政策与战略的最高政治目标。就此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是现代西方霸权主义战略的三个演变阶段，各个时期西方大国战争计划既有各自的具体特点,又有共同的时代特征和连续的历史线索贯穿于其间，这些战争计划的总和反映着现代西方大国战略的整体面貌。

（四）

全文主要由五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着重阐述 20 世纪西方大国战争计划的历史条件和总特征，第二、三、四部分具体地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冷战时期西方大国战争计划的基本情况、战略思想、计划体系及其演化轨迹，第五部分从整体上剖析 20 世纪西方大国战争计划的主要战略特征。结束语部分对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作了概括，并从思考我国现实国防战略问题的角度，扼要地分析了冷战后西方大国（主要是美国）战略意图、防务计划和战争准备的动向，以及我国面临的长期安全态势。

一、导论：战争、战略与时代

任何国家的战争计划都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在 20 世纪，西方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它们驱动和策划了一场又一场战争，不仅有掠夺弱小国家与民族的殖民主义侵略战争，有大国之间相互争斗的所谓“小型战争”，更有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灾难和战争恐怖的两次世界大战和持续长达 40 多年的全球冷战。频繁发生乃至近乎登峰造极的战争，使西方大国战略继 19 世纪之后进一步发达，并构成了一个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发展阶段，其基本特征就是少数几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竞相走上以武力争夺势力范围的扩张道路，它们制定战争计划的最高宗旨是霸权主义，所奉行的基本战略路线是地缘政治路线。这个特征孕育于早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时期，到 19 世纪后期大体形成，尔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时期愈加昭著，又在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的全球争夺中达到极点。这是 20 世纪西方大国战争计划的历史背景，并为之打上了一个鲜明的时代烙印。

（一）霸权主义与战争

战争是社会矛盾的最高表现形态，其时代特征决定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任何一场战争，无论其动因、进程与后果带有多么强烈而复杂的偶然性，终究不能脱离客观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

无不受各交战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政治状况、内外政策、经济技术条件、军事力量、自然环境、联盟关系以及总的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战争计划固然是统帅意志与智慧的产物，甚至常常带有浓重的统帅个人风格。然而，归根到底，统帅同样是社会造就的。在统帅头脑中形成的战略思想从来不是纯粹主观意志的自由创造，而只能是对客观社会环境的能动反映。战争的时代特征具体地表现为一定的阶段性发展标志，这种标志反映着战争与社会的本质联系，贯穿于一个相对完整的历史时期，规定着这个时期内战争的性质、内容与面貌，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刻画着战争演变的历史轨迹。以战略的观点看，战争无非是政治的继续，没有其他什么标志比政治更适于集中表现战争的时代属性了。考察一个历史时期中的战争，应当首先考察这个时期的政治以及战争与政治的关系，而在政治的背后又有着更深刻的经济本原，乃至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

主导 20 世纪西方大国对外政策与战略的政治是强权政治，其最高形态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这个政治为 20 世纪西方大国战争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列宁在 20 世纪初期深刻地指出：“如果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民族战争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开始，那么帝国主义战争就表明资本主义的终结。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这段时期，充满着帝国主义的政治。给现代战争打上完全不同的烙印，把它和过去所有的战争区分开来，——这就是帝国主义”；[1]“‘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2]列宁的论断概括了当时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并为尔后西方大国的战争作为所进一步证实。简而言之，20 世纪西方大国的战争史无非是一部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史。

由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本质所决定，西方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不是历史的偶然现象，而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必然产物。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开始加快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争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资源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日益激烈，这种斗争每天都在经济领域内进行着，并经常引发政治军事冲突。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大国之间的矛盾逐渐超出一般民族冲突范畴，从局部地区发展到全球范围，它们的战争随之具有了与以往根本不同的社会性质。在 19 世纪的最后 30 年，实力发展最快的几个西方大国以武力大肆推行殖民扩张政策，这是现代帝国主义战争的最初表现。到 19 世纪末，全世界几乎被瓜分完毕，重新划分殖民地开始成为导致帝国主义战争的主要动因。起初，帝国主义战争仍大都表现为殖民战争的继续，能够反映新的大国矛盾的只有不多的几场，其中最具有代表性是美西战争和日俄战争。这些战争的数量虽然不多，却是“世界历史新时代的主要历史里程碑”，[3]表明在西方大国之间已经没有多少妥协余地，它们开始在战争中进行直接较量。这些在当时被称为“小战”的局部战争还不能解决重新划分殖民地的重大矛盾，帝国主义列强更关心能够决定命运的“大战”。集中着国际矛盾焦点的欧洲是局部战争的主要策源地，更是孕育世界大战的温床。在 1870—1871 年普法战争之后，处于“武装的和平”之中的欧洲列强一直在准备打击对自己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无论是同盟国集团还是协约国集团，无不早已变得迫不及待，于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火星便把席卷整个世界的战火点燃了。这场大战是西方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首次总决战，在战争双方都毫无正义性可言。

第一次世界大战远未解决世界霸权的归属问题，只是导致西方大国之间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改变了斗争格局。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际，新的霸权冲突便以更大规模在全球展开。到 30年代初，随着英、法两国继续相对衰落，德国从战败中逐渐复兴，美国和日本走上更具野心的扩张道路，以及苏联变得日强大，西方大国的争夺出现了错综复杂的局面，当时发生的持续数年之久的世界经济危机，又进一步加剧了列强之间的矛盾。争

夺霸权仍然是列强的最高政治目标，它们的矛盾无法调和，这是再次导致世界大战的根源。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更甚的是，新的冲突旋涡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日本，另一个仍是德国。1931 年日本制造“9. 18 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开始大举实行蓄谋已久的侵略计划，这标志着日本最先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正象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所表明的，日本的野心不仅是统治中国、统治亚洲，而且还要征服整个世界。在欧洲，德国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更不能忍受帝国主义同伙强加给它的充满屈辱的凡尔赛和约。由于英、美两国采取了纵容和扶持德国的政策，幻想这样便能保留一个制衡欧洲的工具，致使德国得到了恢复实力、重新走上侵略道路所必需的外部条件。日本和德国是制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祸首，它们的侵略战争政策带有强烈的法西斯军国主义特征，表现出现代帝国主义的极端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反法西斯国家、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战争中的胜利，促进了国际社会的进步，带来了影响极其深远的历史后果。但对几个西方大国来说，世界霸权落入谁手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战后出现了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力量中心，这意味着更激烈的霸权之争必然以新的格局展开。这样，在大战之后，西方大国集团象以往一样立即从停战线开始进行新一轮争夺，发生变化的不过是继德、日、意的霸权梦想破灭和老牌的英、法殖民帝国解体之后，美、苏成为超级大国，走上了争夺世界霸权的舞台。冷战无非是 19 世纪末以来西方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这个总的历史进程的继续，或者如布热津斯基所言，是“历史悠久的大国角逐中最新的一幕”。[4]就此而言，在冷战时期大国政治舞台上仍旧演出着老戏，只是唱戏的换了新角。美、苏的霸权争夺以及西方殖民主义政策的延续，使国际社会长期笼罩在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之中，并导致了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

是美国侵略朝鲜和越南的战争，以及苏联入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富汗的战争。

纵观 20 世纪战争史，从列强纷争，到法西斯国家妄想瓜分欧亚非大陆，再到美、苏谋求独霸世界，呈现出一条清晰可见的历史轨迹。在这个历史过程中，西方大国战争政策的最高目标始终是争夺世界霸权，这是 20 世纪西方大国战争的基本政治内容，它决定着一百年来西方大国战争计划的时代特征和演化方向。

（二）从势力均衡到地缘政治

20 世纪西方大国对世界霸权的争夺制造着战争，也制造着与之相应的战略。地缘政治就是霸权主义政策在战略上的集中表现，它规定着西方大国战争计划所遵循的基本战略路线。

1. 西方地缘政治的本质

在西方国家，地缘政治（Geopolitics）一语有两种意义，一个是理论的，一个是实际的，两者同根同源，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理论的地缘政治即地缘政治学，这是研究全球地理状况如何影响国际关系、各国对外政策乃至历史发展进程的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对现代西方战略思想影响很大。地缘政治学诞生于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主要创始人有英国的麦金德、德国的拉采尔和美国的马汉等。在此之后，各种地缘政治学派别和观点层出不穷，到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泛滥，以豪斯霍夫为代表的德国法西斯理论家使地缘政治学发展为极其反动的侵略扩张理论。至今，地缘政治学仍是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后一种意义上的地缘政治，即一个国家在对外政策与战略中实际奉行的地缘政治路线。按照西方国家的权威解释，“地缘政治是综合考虑政治、外交、社会、经济和军事诸因素的总的战略路线（an overall strategic ap-

proach）。它与国家或国家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涉及国家权力的整个基础，包括人口、工业、贸易、金融、国内社会秩序、资源、国家意志以及军事力量。地缘政治的要旨是在国际关系中考虑国家的幅员、形状、位置和特征。”[5] 在本质上，地缘政治就是西方国家对外政策与战略在地理空间中的最高表现，其基本特征是以经济实力为基础，以武力为强制手段，谋求实际占领或控制别国领土与资源，最大限度地扩张本国的势力范围，最终目标是实现权力的绝对集中即世界霸权。

作为一种主导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战略路线，地缘政治产生于 20 世纪，其形成和发展轨迹同西方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相一致，这不是偶然的。地缘政治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产物，反映着强权利益在对外政策与战略上的要求。如上所述，从 19 世纪 70 年代起，资本主义发展最快的几个西方大国开始疯狂扩张，在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建立殖民地。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劳动人口、资源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是帝国的命脉，而地理扩张又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方便之途。于是，早在 16 世纪就已经开始的西方殖民过程在新的经济技术条件下迅速达到顶峰，在短短的 30 年里几乎将整个世界瓜分完毕。从这时起，地球上便不再有所谓“无主之地”，西方大国关系随之紧张到这样的地步，无论谁迈出哪怕很小的一步，都会踩在对手的脚上。在关系到各自势力范围的问题上，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讨价还价的余地（这类丝毫不顾弱小民族利益的大国交易是屡见不鲜的），大国之间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改变世界政治版图。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争夺世界霸权为最高目标的地缘政治应运而生，并很快泛滥于西方大国，成为它们的基本战略路线，从而使国际政治力量的地理分布以及国家之间的相对地理关系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略意义。概括地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政策，以及世界各地区、各民族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就是

地缘政治在西方大国赖以形成和泛滥的历史土壤。

西方地缘政治是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利益归根到底是经济利益，并具有超出以往任何时代的强烈的垄断性、剥削性和掠夺性。取得这种经济利益必然以政治权力、特别是暴力的使用为前提，因为经济本身并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垄断经济在一国范围内的发展要求政治权力的支持，它向全世界的扩张更要求以强制的政治手段开辟道路，通过军事征服和政治控制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这个关系决定着国家利益直接地表现为势力范围，或者说只有实现地缘政治利益，才能实现垄断经济利益。20 世纪西方大国的典型情况表现为，经济圈、政治圈和军事圈相互重合，至少在大体上重合，所谓势力范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是一体化的，“防卫圈”与经济区是相同地缘政治概念的不同表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还是这样，冷战时期依然如此，北约和华约无非是两个对峙的巨大地缘政治堡垒，它们是政治军事联合体，同时又是经济共同市场。所以，西方大国所谓国家利益不是别的，就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地缘政治利益，这是西方大国国家利益在战略上的表现，归根到底是霸权利益。

西方地缘政治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有当这种条件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的时候，它才脱胎出来，不再仅仅是一种影响战争与战略的一般因素，而是成为一个受强权扩张利益支配的战略路线，开始在西方大国的全球战略与战争计划中占据主导地位。下面还将具体地分析几个西方大国在 20 世纪各个时期的地缘政治表现及其对战争计划的主导性，这里仅扼要地指出，西方地缘政治是以谋求世界霸权为最高宗旨的基本战略路线，它规定着西方大国国家利益的基本内容，从而规定着它们的基本战争动机，即不断地扩大本国的势力范围，由此获得更多的垄断经济利益，更稳固的强权优势，以及更有利的战略地位——这就是 20 世纪西方

大国战略的总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意识形态问题时曾这样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6]地缘政治便反映着 20 世纪西方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需要。

2. 两个世纪的比较

在西方理论界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认为自法国大革命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止是西方大国战略的“地缘政治时代”，从 1945 年到 1990 年是“冷战时代”，在此之后是“冷战后时代”。[7]这个观点肯定了地缘政治在近现代西方战略中的突出地位，但把 19 世纪拉入“地缘政治时代”，又把冷战时期排除在这个时代之外，这样就混淆了近现代西方大国战略的演变轨迹，从而模糊了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西方大国战略的政治本质与时代特征。另有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认为，18、19 世纪是势力均衡战略盛行于西方的时代，20 世纪受“地缘政治均衡”[8]的支配。这种观点虽然在形式上把 20 世纪同 18、19 世纪区分开了，但没能从实质上指出地缘政治与势力均衡的历史联系与差异。“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9]势力均衡与地缘政治是两个不同时代的战略印记。在 18、19 世纪，盛行于西方大国的基本战略思想是势力均衡， 20世纪则是地缘政治占主导地位，势力均衡从属于地缘政治。为了更清晰地指出 20 世纪西方大国战略的时代特征，有必要追溯一下 19 世纪的情况，把西方大国在两个世纪的基本战略路线作个概要的比较。

应当说在 18、19 世纪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列强）的战略中，不仅存在着地缘政治因素，而且这种因素比过去西方历史的任何时期表现得都更突出，这在拿破仑的霸权野心中已经清楚地显示出来。不过，总的来讲， 19世纪欧洲大国战略是西方近代战略的顶峰和最后阶段，这时地缘政治还带有区域局限性，尚未成为主导西方大国向全球扩张的基本战略路线，因为这样的社会历史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件还不成熟。大国关系和殖民扩张是当时欧洲列强对外政策的两大问题，战略的焦点集中于前者即解决大国之间的冲突，至于殖民扩张，在当时不过仍是受资本主义本能驱使的野蛮侵略，并没有多少战略的内容，这同 20 世纪的情况大不相同。在早期的殖民扩张中，世界上尚有广大地区未被西方大国征服，它们之间的殖民纠纷还不难以排解，往往只是在地图上多划几条势力范围分界线而已，用不着象 20 世纪那样思考复杂的地缘政治逻辑。正如 20 世纪初一位英国学者所意识到的，“仅在半个世纪以前，政治家还只在几个棋格子里走棋子儿，棋盘上的余部都空着。但是，现在的世界业已成为一个星罗棋布的棋盘，政治家的每个行动都要考虑一下棋盘上所有的棋格。”[10]这是一位敏感的跨世纪人物对两个世纪差异的亲身感受。

在欧洲内部，支配大国关系、从而决定大国战略的主要原则就是所谓“势力均衡”，即在几个大国之间维持一种相对稳定、相互牵制的多元格局，对弱小国家和民族无非是殖民主义、强权政治。18、19 世纪的欧洲处于由封建社会加快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上升阶段，政治动荡，大国不断兼并小国，强大的民族国家逐步崛起。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种业已形成的均衡局面很难维持长久，不免在大国的竞争中被打破，为新的均衡格局所取代，而新格局的形成又总是同大国的领土扩张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在德意志，18 世纪初还是一幅支离破碎的景象，兴起于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已经名存实亡，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交错分布着数百个各自为政的小邦国。但 100 年后，享有主权的邦国和自由城市仅存不到 40 个，可见当时领土吞并的过程相当剧烈。每当一个大国得到一份新的领地，都会引起其他大国采取相应的反措施，以便维护自己的实力地位。这就是说，地缘政治扩张在 18、19 世纪的西方已经普遍存在，在均衡格局的转换中起着促动作用。但是，地缘政治扩张的极限是大国的均衡，小国不断消失，少数大国则

在扩张中维持总的均衡。

19世纪欧洲的均势格局形成于拿破仑战争之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破坏了原有的建立在封建原则上的传统均衡局面，使欧洲面临受法国统治的危机。这场危机以法国的失败而告结束，清算拿破仑战争的维也纳会议确立了英、俄、奥、普、法五强格局，并保持了半个世纪。比照20世纪的情况来看，19世纪欧洲的五强均势格局只是一个不大的竞技场，地缘政治因素固然存在于大国的政治与战略考虑中，但不起主导作用。当时，欧洲列强无不指望保持和加强自己的地位与声望，影响它们制定对外政策与战略的主要因素是扩大殖民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阻遏资产阶级革命以及防止对手变得比自己更强大，至于哪个因素起主导作用，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之后，俄、奥、普三国于次年发起建立神圣同盟，以遏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反对欧洲民族解放运动，这在一个时期里成为欧洲大国关系得以保持稳定的主要因素。大国之间的矛盾并没有因为这个联盟而消除，只是对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共同恐惧暂时压倒了大国的争斗，它们只有在制止革命之后才能腾出手来解决相互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其他大国情愿让反对革命最积极的俄国沙皇暂时扮演一下“欧洲宪兵”的角色，而不用太担心早已尽人皆知的俄国霸权企图。但是，它们一经认为革命的危险不是那样严重了，就会转而继续寻求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大国之间的矛盾就会显现出来。这些矛盾是错综复杂的，最突出的是所谓“东方问题”和“德意志问题”。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而发生的斗争，清楚地反映了当时大国战略的基本特征。

东方问题是19世纪欧洲大国矛盾的主要焦点之一，问题的实质在于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解体，应当如何填补和分配它在巴尔干和近东广大地区留下的势力真空。几个欧洲大国都对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抱有野心，但谁都不敢肆意向那里扩张以致引火烧身，同

时又都害怕其他国家在这个地区抢占优势，从而打破业已形成的均势体系，这就是19世纪势力均衡格局面临的典型矛盾。俄国对摧毁和瓜分奥斯曼帝国最积极，这是它渴望已久的事情，因为这个衰败的帝国阻挡着俄国向地中海和印度洋扩张的道路。早在17世纪末，彼得一世就把打击土耳其列为俄国扩张战略的主要目标之一，一心想进入被土耳其苏丹视为比自己的后宫还紧要的黑海地区。[11]俄国的地缘政治扩张欲望是强烈的，但它向黑海的扩张一直受到土耳其的激烈抵抗和其他欧洲大国的制衡，即使到了19世纪上半叶，沙皇仍不敢无所顾忌地把传统的扩张战略付诸实施。在1828—1829年的俄土战争中，彻底摧毁土耳其帝国的某种可能性已经出现，巨大的地缘政治利益唾手可得，但俄国很清楚为获取这个利益而动摇欧洲均势的危险，认为保留一个受俄国控制的土耳其帝国比公开霸占它更有利。[12]1848年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后，俄国认为实现传统野心的历史机遇已经到来，实际上却错误地判断了当时欧洲局势的性质和其他大国的意图，结果俄土冲突引发了一场俄国与英法之间的克里木战争（1853—1856）。俄国在克里木战争中的失败使它丧失了欧洲仲裁者的地位（关键在于欧洲已不再需要俄国担当这个角色），开始走下坡路，俄国的扩张计划终究未能突破整个欧洲的势力均衡格局。

与东方问题不同，在围绕着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斗争中，几个欧洲大国都是按照势力均衡的原则行事的，斗争的结局则是普鲁士更为精明的势力均衡战略取得了胜利。普鲁士统一德意志的进程开始于1848年革命，到60年代，随着国力的增强和国王威廉一世（1861—1888）加冕主政，普鲁士的统一斗争进入了最后阶段。普鲁士十分明白，在表面上仍主宰着德意志的奥地利不会自动退出德意志政治舞台，其他欧洲列强同样不会欢迎德意志的统一，它们为维持既定的均势需要一个分裂的德意志。普鲁士的主要敌人是奥地利和法国，其中法国又是最危险的，它比处境

益窘迫的奥地利更强大，素有向德意志扩张的野心，并控制着德意志的南方数邦。针对这个局面，普鲁士在俾斯麦主持下制定了一个精明的战略，基本方针是利用欧洲大国之间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矛盾，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小德意志”。俾斯麦面临着复杂的外交任务，必需排除几个大国联合起来对付普鲁士的可能性，而且在逐个打击奥、法两国时，即使不大可能赢得英、俄的支持，至少也要避免它们的干涉。普鲁士的外交策略是稳住需要普鲁士制衡法、俄的英国，拉拢克里木战争后陷于孤立的俄国，先打击奥地利，再打击法国，在打击奥地利时又要稳住法国，击败奥地利后还要化敌为友，以便最后同法国决战。普鲁士按照这套计划先后进行了对丹麦的战争（1864）、普奥战争(1866）和普法战争(1870)，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普鲁士的胜利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新的均衡代替了神圣同盟时期形成的那种政治因素多于实力因素的均衡，更为准确地反映着欧洲列强的实力对比。从对外政策与战略上看，普鲁士的成功主要归因于，它比自己的敌人更出色地运用了势力均衡战略，孤立了当前打击的主要对手，同时使其他大国在相互之间利益与力量的制衡中无所作为。

从 19 世纪的大国冲突中可以看到，这个时期欧洲大国对外政策与战略同 20 世纪有明显区别。在 19 世纪，欧洲还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正在积累经济实力，发展资本主义关系，以及进行更大规模的殖民扩张，这时普遍的全球政治经济联系尚未形成，西方大国对外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即争夺世界霸权还在孕育之中。当时国际矛盾的中心在欧洲，表现为几个大国之间为扩大势力范围以便建立对自己有利的均势而发生的冲突，整个斗争格局在客观上不是地缘政治的，而是势力均衡的，谁也不能指望突破这个大的框架。英国之所以能够在 19世纪保持“日不落帝国”的地位，主要得助于欧洲的均衡局面和自身的战略地理优势。同 20 世纪西方大国的全球地缘政治角逐相比，受势力均衡支配的大

国战略只能是目标有限的扩张战略，这在东方问题和德意志问题中表现得相当充分。拿破仑的霸权计划和俄国从彼得一世那里继承下来的扩张战略固然带有很强的霸权野心，但其主要战略意图基本上没有超出欧洲的范围，何况这样的地缘政治野心注定会很快在几个大国的联合抗衡下灰飞烟灭。相比之下，俾斯麦则深谙当时欧洲的政治逻辑，精心策划了所谓“小德意志”计划，在实现这个目标后又宣称“德国是一个感到满足的国家”，这无非表明自愿服从势力均衡的约束，这同此后威廉二世的“大德意志”计划成为鲜明对照。

应当指出，时代变迁并不排斥历史联系。自由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有着直接的内在关联，从 19 世纪势力均衡转变到 20 世纪地缘政治不会没有历史连续性。在实质上， 18、19 世纪的势力均衡同样是强权扩张的战略路线，每一个新的均衡格局的产生无非是大国领土扩张的结果，只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扩张还不足以彻底打破均衡局面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说， 20 世纪的地缘政治是 18、19 世纪势力均衡的直接继续，这时在扩张中保持均衡已不再可能，西方大国矛盾发展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在这个冲突中，势力均衡并没有从西方大国战略中消失，只是已经远远不能表现它们的霸权野心和战略需要。事实证明， 20 世纪从未出现过相对稳定的列强均衡格局。霸权主义意味着征服的欲望远比共存的要求更强烈，20 世纪西方大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维持相对的均衡格局，而是谋求绝对的世界霸权，这是任何势力均衡战略都无法实现的目标。因此，在西方大国的战略思维中，势力均衡战略与世界霸权目标根本不相适应，只能起某种暂时的策略作用，起主导作用的只能是地缘政治路线。换而言之，在 19 世纪地缘政治从属于势力均衡，在 20 世纪则恰好相反，势力均衡被纳入了地缘政治的框架。如果说普法战争之后的几十年是西方大国战略势力均衡路线向地缘政治路线转变的过渡阶段，那么第一次世界

大战则标志着势力均衡格局的总崩溃和地缘政治冲突的大爆发，在此前后，几个西方大国相继走上争夺世界霸权的地缘政治道路。

3. 地缘政治与战争计划

战争是西方大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主要方式。20 世纪的世界一直处在被西方大国势力范围分割的状况中，这主要是战争的结果。只有经过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一个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版图才会出现重大变化，一种大国势力范围格局才会被另一种格局所取代。甚至世界大战也只能带来一个暂时的结果，按照地缘政治的逻辑，在没有达到绝对霸权之前，任何局面都是不能持久的。冷战同样表现着地缘政治与战争的本质联系，因为即使抛开连绵不断的局部战争不论，美、苏冷战本身就是一场长期高强度的全球军事对抗，新的世界大战没有爆发，但始终没有停止激烈的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大国的地缘政治企图在战争计划中得到最高体现，在这里霸权主义的扩张战略思想表现得最为清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再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冷战，西方大国战争计划始终是按照地缘扩张的要求制定的，表现着一种地缘政治路线与另一种地缘政治路线的对抗。

几个西方大国都有各自在长期领土扩张中历史地形成的地缘政治环境，在社会政治状况、相互之间的力量对比、战略地理条件以及历史传统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它们的战争计划所采取的地缘政治路线无不带有自己的一些特征。就基本方面说，那些实力发展较快、对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抱有狂热欲望的国家，如两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德、日和冷战时期的美、苏，其霸权野心更大，侵略扩张性更强，达成战略目标的要求更急迫。这类国家总是采取进攻性战略，并按照一定的全球战略方针进行长期战争策划。一旦它们公然将自己的地缘扩张计划付诸施行，必然同其他大国发生严重冲突，从而成为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并影响其他大国的战略取向。德国曾经是进攻性战争计划最发达的帝国主义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